甲午战争的启示与教训

尹福庭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这次战争,无论对中国和日本乃至国际政治格局都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就中国来说,这次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老大的中国被东洋小国日本打败,割地之广,赔款之巨,都是空前的。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并导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大祸,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严重了。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先后掀起了戊戌启蒙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嗣后又有五四爱国运动。这些运动,追根溯源,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甲午战败的深刻影响。

就日本和国际政治格局来说,由于日本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并参与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战前,远东地区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战后,俄国、法国都加强了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的争夺,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则先与沙俄争夺,继与美国抗衡,从而引起东方以至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一系列变化。就日本自身而言,甲午战争固然使它成为远东的暴发户,但同时也从此走上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道路,1937 年再次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使中国和亚洲各国备受欺凌和战祸之苦,也使日本人民历经法西斯的暴虐统治,最后导致 9145 年的惨重失败,受到应有的正义惩罚,日本人民则蒙受原子弹爆炸的空前灾难。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东方大地。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回顾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凌辱、残害和奴役,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今天研讨这次战争,当然不是为了抒发感慨,勾引起昔日的创痛,而是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联系今天的现实,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以启示将来。

这次战争中国之所以战败,有一点是多数论者都承认的,即洋务运动没有搞好,日本之所以战胜,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是两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政治运动。就两国原有的基础和起步的时间说,基本上大同小异,但经过十九世纪后半叶三十年左右的实践,到战争爆发前夕,两国的近代化运动却获得显然不同的结果。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到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具规模,明治政府虽然以天皇专制为中心,但在 1890 年已创立了帝国议会,设有贵族院和众议院,并成立了自由党和进步党,由两党轮流执政,政权性质日益趋向资本主义化,并在外交上开始废除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与列强基本上取得了平等地位。从总体上看,日本已初步转变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方面虽然取得明显的成效,但它却长期停留在这个较低的层次上,根本不想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尽管也有个别方面涉及到上层建筑领域,如变易兵制,改革教育制度,但均浅尝辄止,而不能深入下去,始终也未能形成一场真正的社会改革运动。结果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近代化,上层建筑还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封建专制政体,经济上虽然有了一点资本主义经济,但十分微弱,整个经济仍然停留在封

建落后的状态，因而也就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不能不成为双方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有的人可能会说，当时中国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落后多少，个别装备甚至还优于日本，这的确是事实。但不能忽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差距。正如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死前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时所说："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遗折》）事隔十年以后甲午一战，恰恰被他的话所言中了。

至于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何以能够获得成功，中国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搞好？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内外原因很多，这里不能详论。仅就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大势来说，凡属被迫进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落后国家，除了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外，还必须同时内而改革封建制度，外而争取民族独立，近代化才有可能顺利实现。日本明治维新是这样做了，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获得了基本成功；而中国洋务运动却未能这样做，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便没有化好。这条历史经验说明，即任何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能获得成功，不能只抓一点而不及其余。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想对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改革同样有启示意义。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当然这种改革只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并不存在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是，只要是一种社会改革，它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党和国家一再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有的同志往往片面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经济上去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姑且不说，没有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即或是一时上去了，却带来人性的沦丧，这种成功的意义何在？因为经济的成功，其终极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算不算经济成功都是成问题的，更不要说国家的真正富强了。这是我想说的这次战争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

中国甲午战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落后固然是重要因素，甚至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这个道理。但它又不是绝对的。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国的政治、经济虽然落后于日本，但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又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日本虽然先进，但日本是个小国——地小人寡，又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所以就综合国力和正义非正义而言，中国显然优于日本。这个道理连李鸿章也是懂得的。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以后，他曾针对日本可能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说："中国地大物博，但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李鸿章奏稿》）卷24）在这次甲午战争中，当清军在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相继败挫以后，他又向光绪皇帝提出："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此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奏稿》卷78）那么，他的持久战主张何以未能付诸实践，中国还是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了战争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因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要坚持同一个小而强的日本长期作战，并战而胜之，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办到。当时的清朝政府从上到下可以说已经腐败到极点，它怎么可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同敌人打持久战呢？就以实际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太后来说，在国家财政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安荣享乐，竟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其腐败情形已可见一斑。更不要说在战争期间，敌人已在花园口登陆正向旅顺逼进的时刻，她仍然在紫禁城里隆重地举行六十大寿庆典了。至于政府的各级大小官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更是比比皆是，老百姓早已恨之入骨。军队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上层钻营舞弊，士兵纪律废

弛，出征沿途肆掠，居民逃避，均非个别现象。这样一个已失掉民心的腐败政府，防民尚恐来不及，当然不可能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入侵之敌打持久战。其实李鸿章的持久战建议，虽然是以"广土众民"为基本条件，但他所要依靠的仍是政府的力量，并非人民群众的力量。这说明，与人民群众处于严重对立的封建统治阶级，是实行不了持久的民族战争的。所以，当他们在正面战场一再失败的情况下，就只好不惜丧权辱国同敌人乞和了。平心而论，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都不是一开始就甘心出卖国家主权而不想反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当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是不惜以牺牲民族利益来维护其阶级利益的。这是一切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的共同规律

以上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腐败的政府，是保护不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因为腐败必然失掉民心，自毁长城，就不能聚集全民族的力量，战争中原有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人们常说，廉能聚众，廉能生威，将帅廉洁能敌百万兵，确实是至理名言。这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否杜绝腐败，实是关乎国家强弱、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所以，就一个国家来说，除了应该高度重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外，更应该重视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才能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筑起团结御海的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也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巩怕是这次战争给予我们的另一点启示吧！

谈起甲午中国之败，人们往往首先要谈到的一个话题，即李鸿章为了避战求和，幻想依靠俄、英调停，而贻误了战机。这一点，李鸿章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实无可辞。"（《翁同和日记》）李鸿章为什么要避战求和呢？因为这是他的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有一句所谓名言，即"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朋僚函稿》卷19）他之所以持此主张，一是他认为中外力量对比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奏稿》卷24）二是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只有变法自强，而变法自强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苟动为外人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奏稿》卷39）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他把对外"主和"视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每当中外冲突初起，他总是企图利用"以夷制夷"的谈判手段来消弭战争，即所谓"避战求和"，而不做积极的战争准备。当战争打起来以后，虽然他并不完全回避战争，但其目的仍是以战为和，即以战争做为手段，只要能达到"和款可无大损"，就应当及时言和。1884年中法战争，他在谅山大捷之后，力主"乘胜即收"，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电稿》卷5）就是他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次中日战争，当清军在陆海军相继败挫之后，他所以要提出"持久战"的建议，是因为在他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言和"对清政府是不利的。所以当慈禧命他请俄使喀西尼再出面调停时，喀西尼劝他应及早议和，他回答说："议和要看条件如何？如吃大亏，不若久战。"（《译署函稿》卷20）但是，他所谓的"久战"，并不能利用广土众民的优势，只是在正面战场分兵把口，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企图用"持久以困之"的办法，造成敌人因久困而力绌，以便为议和提供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他又在慈禧的授意下，派员赴日本探商议和条款，只要是对方条款不至过奢，即随时准备同敌人议和。用这样的思想指导战争是没有不失败的。在战场上，日军很快突破了清军防线，清军则一溃再溃，李鸿章所期待的那种局面自然不会出现，最终在谈判桌上也只能是以"吃大亏"结束了这场战争。

上述事实说明，中国甲午之败，与李鸿章的"和戎"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他的错误并不在于对外主和，而在于他把主和视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无论是采取谈判的手段还是战争的手段，都是以"和"为最高宗旨。换言之，即幻想以妥协退让的办法，来保持一个百数十年的和平环境

进行变法自强。事实上在列强环伺下的中国是根本办不到的，当它们的侵略目的达不到时，总是要诉诸战争的，更何况列强既然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进行争夺，它们也不允许中国强大起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变法自强同争取民族独立结合起来，既不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又要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而变法自强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李鸿章的错误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今天的中国虽然是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真正成为发达国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当前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比较有利的，但也并非风平浪静，更何况某些西方大国并不希望我们真正强大起来，它们不断地搞些小动作来干扰我们的建设。此外，日本又有所谓“新右翼主义”抬头，他们根本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罪行，这就更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百年前那种所谓西方对东方的双重挑战，今天也并没有完全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既要坚持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坚决抵制来自西方形形色色的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为振兴中华服务，迎来中国的真正复兴。我想，这也是这次战争给予我们的又一点启示吧！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它给予我们后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以上几点粗浅的看法，有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此外，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总结甲午战争的教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也是日本人民的事，甚至是世界人民的事，因为这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新的思想基础，衷心地寄希望于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往事为鉴，绝不能再让过去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历史重演。

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

沈渭滨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群，往往是 社会良知的化身，忧国忧民即是他们的本色。晚清以来，尽管士风颓败，士习浮嚣，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大多数士子仍能以家国为重、与民同忧。其中，一些身居朝廷要职而又恪守“明道救世”儒学原旨的有识之士，更突出地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他们的言论，主张和作为，在一片妥协声浪中犹如一股涓涓的清流，显出了傲然不群的风骨，做了社会的脊梁。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翁同和，即是这群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翁同和早年经受过严格的儒学训练。他六岁入塾，受读《四书》、《五经》、《毛诗》等儒学启蒙著作。1841 年 12 岁时，因避战乱迁居苏州，得与父亲翁心存的门生汪鉴斋 同游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对范仲淹所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颇有心悟。次年又从父亲的讲课中得知瞿式耜、顾炎武的抗清斗争事迹，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铭刻极深。青年时代，除继续研读儒学经典外，又从先秦诸子、历史著作及唐宋八大家中汲取丰厚养料，尤对《周礼》推重备至，以为安邦治国之道尽在于斯。他学问渊博，又知耻躬行，熟悉历代典章制度，主张通经致用，隐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852 年 23 岁中举，1856 年 27 岁中状